



## 十年變革：另一個使命時代的結束

墨菲 著  
湯漢 譯

(編者按：墨菲為美國新澤西州天主教西東大學名譽校長，過往十年來熱心促進中美交流。)

執筆本文時，我們快要步一九八零年代的終結，亦觀察著中美兩國關係轉變的起伏。八零年代，真是很不尋常的十年。一九八零年，中美兩國政府與人民終於開始熱切地發展尼克遜及毛澤東於一九七一年所奠立的開放交往。在那第一次「尼克遜震撼」之後，確需一段時間去作好準備，才能進行文化、教育、貿易、政治及甚至軍事上的交流。無疑，這是因為兩國的內政問題導致這種拖延。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剛結束，隨著而來的是毛澤東的殞落和鄧小平的浮升；在美國，尼克遜捱受水門事件之打擊，而卡達亦備受伊朗革命的壓力。不過，七零年代仍有進步；當一個比較平靜的十年開始時，交流事件便開始發生。

一九八零年，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基本上是友好的。與中國冷戰已結束，一個合作的新時代展開。其中固然有些人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只看到美國消費品的龐大新市場的發展前景，以及在藝術家、教育家和知識分子之間建立信任關係及自由交

流意見的展望。中國宴會時代開始了；有飛往中國、備受款待的令人陶醉的經驗，也有無數宴會的舉杯，親身參觀紫禁城、長城和長江三峽。的確，在開放交往的歡樂後，大家已漸漸意識到，中國還要付出很大努力和忍耐才能產生真實的進步。

一般說來，早期訪華者深被他們所見到的事物所吸引，視之為共產黨革命的成功。在美國人眼中，一九四九年所吶喊的「中國人站起來」的口號，毛澤東及其同僚所許下的殖民主義的結束，就等於宣佈了一個自豪及自足的民族已在世界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他們大多數忘記了昔日對共產主義的怕懼。有些人還認為，國際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使命性呼籲對中國來說是可以理解的。西方人對所見到的一切表示欽佩，視之為無產階級及服務人民的靈丹，也看重他們所取得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是永不會重演的反常現象。當然，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歷史掌握不深，對本世紀運行著的社會動向亦瞭解膚淺。

八零年代初期訪問中國的西方天主教徒，并非都有同一的想法，但大多數相信中國教會在多年壓抑之後，正進行著生氣勃勃的復原工作。一九八零年就至少有四十所天主教堂開放，讓信徒前往崇拜天主，也計劃著開辦兩所男修院；整個氣氛是一種文化大革命後大解放、大欣喜的情況。有一團美國天主教徒還與當日宗教事務局長蕭賢發在北京飯店共進午餐，交談長達四小時。最後，蕭局長多謝他們的善意，并在談到中梵之間的緊張關係時，鼓勵他們忘記過去。總之，教會的前景似乎充滿希望。

大家都同意，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雙方將會從接觸、互訪及會晤的發展中得益。目標是加深相互瞭解和尊重，促進與普世教會的共融。第一個重要時機的到臨發生在一九八一年十月，當時有一個中國基督教和天主教聯合組成的代表團獲准前往參加在加拿大滿地可舉行的國際合一會議；這是一項突破。隨後數年，他們還作了多次出國訪問。八零年代中期，中國開辦了數間修院，也恢復更多教堂。一九八五年七月，上海金魯賢主教率團訪問香港，獲香港胡振中主教設宴款待。金主教當時帶同一位修士訪港，在繼後的每次出外訪問中，他都有同樣做法。在一九八五年七月，被囚在獄中三十年的上海龔品梅主教獲釋，在張家樹主教的照顧下住在主教府內。八五年十月，首批國外天主教徒被邀與龔主教會面，共進午餐。這幾年來，天主教「關心中國人士」往訪中國的次數增加了，而由於接觸加強，對宗教情況的瞭解也改進了。明顯地，政府很注意這些國外人士

的接觸，加強一切宗教活動的督導，符合統戰部所釐訂的及宗教事務局所推行的宗教政策。天主教愛國會也成了這方面的媒介。

各省、各城市的宗教情況頗有差距，這亦屢屢與地方政府當局和各教會人士的性格有關。很多天主教徒不願與愛國會有任何接觸，拒絕入聖堂參加禮儀，或只肯參加由持守獨身和忠於聖座的神父所舉行的彌撒。這是一幅混亂不清的圖像，充滿著正反交錯的趨勢。亦不時傳出有主教、神父及教友再次被捕。但是，在過去十年間，往訪及交談未嘗中斷。雖然，存在著某些嚴重分歧，但仍懷有很大希望，因為「一主、一信、一洗禮」的聖經訓導為未來的建樹奠下穩固的根基。在聖座與中國政府之間，也有過一些非正式的或透過第三者的接觸。

一九八六年，一團中國天主教人士應美國天主教大學聯會之邀，訪問了美國，參觀天主教如何在該國運作和服務。他們受到教會當局及大學校長們的熱情接待，繼續展開對話。對中國與聖座之間關係的正常化，似乎很有希望，而美國教會亦希望於見到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達至圓滿的共融，并願為此努力。

一九八九年來臨，這是現代地理政治學上顯著變化的一年。在中國，北京四、五月份的事件導致震撼西方的六四事件的發生。此事距今已一年半，西方人仍感不易接受。前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總結說：

「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是在浪漫與敵視兩種態度之間搖擺著。我們對中國持有十分波動的形象，比如有：Fu Manchu

(美國本世紀廿年代流行小說中的聰明歹徒)的邪惡，也有賽珍珠女士筆下的高貴農民……。近年來，美國人變得更加為眼睛瞭亮，拋棄了純敵視及純浪漫的態度。最近數月，我們看見中國的兩個面孔。」(《外交事務雜誌》)

其他分析家注意到，本世紀中國歷史如何標誌著不連續性，而中西雙方如何難於彼此瞭解。中國很難塑造出一個持久的形象，亦不易保持其一貫性，她在對西方開放與排拒之間不斷搖擺著。目前的中國政府對如何向前邁進，似乎尚存有分歧的態度，也發放著不同的政治及經濟方面的訊號。

一九八九年，我們看到蘇聯對東歐的霸權的沉落、德國的統一，以及蘇聯對國家經濟危機的醒覺。歐洲共產黨建立七十年後被人民排斥。連阿爾巴尼亞及北韓亦不能不被這些事件所搖動。西方觀察家懷疑：如果中國繼續推行經濟自由化及政治壓制，則中國如何能成功推動四個現代化，以加入現代世界，成爲一個統一富強的國家？現代歷史證明這點行不通。

人們常說，幾時人民有朋友，國家便受惠。這點道理亦可放之於機構身上而言。中西的最大利益必然是擴展共同利益和重建彼此信任。很多中國的朋友都希望看見這點出現。每一個國家需要理想和指導性的遠景。隨著馬克思預言的失敗，它的國際使命努力

亦告沒落。中國找到甚麼去填滿這個真空的殘局。也許某種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在未來的歲月中可以成功。

我們這幾年正進入新世紀的開端，邁向全球文明的黎明時代；在這時代中，大家應尊重各種文化的差異及各國家的獨立自主。V. S. Naipaul最近在《紐約時報》寫道：這文明是長期以來所塑造出來的，因為歐洲三個世紀以來的擴張主義使它蒙上了種族污染，但追求幸福的理想，包括追求個人、責任、選擇、理智生活、職業理想和成就等理想，都給這文明提供力量。這份理想不能被壓縮爲一個固定的制度，也不可能產生狂熱。亦由於這份理想，其他僵硬的制度最終必被摒棄。

西方天主教徒進入這個未來，深識自己要爲過往的誤會及缺乏信任等罪過，分擔責任。但他們亦知道，信任是信仰的要素，而信仰無分國界。他們完全尊重中國地方教會的成熟，但他們也希望她能與所有其他地方教會，及與聖座達致圓滿的共融。八十年代將在歷史上消逝；我們仍會繼續前進，並常該面對著力行仁愛、實踐真理的挑戰，且要不斷向別人開放，視他們爲兄弟姐妹。我們期望，八零年代的初步開放，能導致九零年代取得圓滿共融的成果。

